

共生 与互动

泓峻◎著

20 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



APO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共生 与互动



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

泓峻◎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生与互动:20 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 张红军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5396 - 3404 - 3

I. ①共… II. ①张…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127 号

出 版 人:唐 伽

责任编辑:秦 雯

装帧设计:陈 爽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合肥瑞丰印务有限公司 (0551)5575666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8.625 字数:20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一

谭好哲

瑞士著名文艺理论家沃尔夫冈·凯塞尔在其名著《语言的艺术作品》中指出,文学作品需要通过一种语言的特别力量来表现,所以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就变成了语言科学的一部分,文艺学与语言学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文学研究者就算只想研究他自己祖国语言的作品也必须有一种基本的、语言学的训练,同时语言学家也只有在语言生活得最强烈的地方,就是在文学作品中进行考察,才能够有所收获。应该说,凯塞尔的这一论述涉及了两个层面的文学理论问题:就研究对象来说,他点明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者也都普遍认可的观念;就研究方法而言,他提出了文学研究的语言学向度,而这在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却常常是被遮蔽了的。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来说,有谁不知道古典文学是以建立在书面语基础上的文言为符号载体,现代文学是以建立在白话基础上的现代汉语为符号载体,又有谁不知道现代文学是由白话对文言的革命所催生的?但是你只要搜检一下各种学术资源库则不难发现,真正从语言与文学相互关系角度研究中国文学史、包括现代文学史的精品力作却并不多见。现代西方哲人有言: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确切地说,人类是借助语言创造自己的家园,尤其是自己的精神家园。由于语言学向度的缺失,致使我们的文学史研究难以呈示中国文学真切的孕育、生存土壤和生长、发育肌理,也难以凸显和揭示其基于语言特性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之真貌和真髓。

或许正是由于上述缺失的存在,当泓峻提出以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内容时,不仅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而且得到了导师组诸位先生的一致肯定。泓峻的论文在毕业答辩时受到匿名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我想首先也与其新颖的选题角度和研究思路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泓峻的博士论文经修改之后就要出版了,他请我为之作序,我感到分外高兴,为他的辛苦之作得以面世而高兴,更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富有探索精神和思考智慧的研究文本而高兴。由于高兴,我也愿意就这篇论文再说几句相关的话,期望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其题旨、窥见其用心,并进而增强对相关问题的关注深度和思考深度。这也就是陶潜诗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本意吧。

泓峻的这篇博士论文没有当下许多青年学者为了吸引人的眼球而故作惊人之语、偏颇之论的时弊,而是在认真研读材料、充分借鉴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是一部自己用了功、用了心而他人也能够见其功力、察其慧心的作品。其慧心所在首先表现于:不是把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定位为谁为主导、谁决定了谁的关系,而是定位为共生与互动的关系。他认为,现代文学在创立的时候,不是在利用一种既成的语言,而是在探索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现代文学最初的实践承担着创造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的双重任务。由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生成的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因此几乎无法确定是现代汉语创造了现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创造了现代汉语。而且,由于现代汉语作为汉语的一种新的形态,到现在其历史还不足百年,对于一种语言形态而言,这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年龄。因此,现代汉语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境界,在整个20世纪当中,特别是20世纪前期,现代汉语仍然处在自己的建设期。在这一建设期内,一方面现代汉语的当下形态对现代文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现代文学的实践也始终影响到现代汉语品格

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它们是共生的;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它们是互动的。从这样一种关系定位出发,论文详细考察、辨析了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之中相互间存在的种种具体情状,如现代汉语的写实性追求与写实主义文学观、“个性主义”文学观的语言追求与现代汉语形成期的修辞观、现代文学口语崇拜观念的语言学依据及其影响、形式审美主义文学观的展开与现代汉语的审美建构、1930年代前后文学大众化转向的语言层面及其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等,内容极为丰富,而观点和结论又是极具说服力的。

论文的慧心所在还表现于:从现代性的维度分析了19—20世纪之交产生语言与文学变革要求的共同语境,以及变革中的文学观念和语言观念的共同价值取向,特别是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西化”与“民族化”的二元性出发揭示了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泓峻指出,19—20世纪之交同时产生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要求的产生基于同一语境,那就是进步知识分子思想中存在的深深的现代性焦虑。近代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合理性,首先是借助于现代性这一大叙事获得的。这使得20世纪前期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有了太多的共同性:一方面,因为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事关民族生存与现代化事业的展开,因而它们被赋予了太重的历史使命,得到了太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在热闹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之中,语言与文学又总是处在工具的位置上,语言的文化承继功能、文学的审美性,往往是被忽视了的。对于二者关系的复杂性,论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一是语言的层面——现代文学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是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语言变革而生成的一种语言。一方面,现代汉语作为汉语的一种新形态,与古代汉语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

上形成的,这使得它仍然与古代汉语保持着一定的同质性,从而与西方语言形成语言类型学上的明显差异。另一方面,现代汉语又是以古代汉语,特别是作为古代汉语核心的文言为自己的直接对立面而建构起来的,在现代汉语建立的过程中,“西化”一直是追求的目标之一。这使得与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无论是词汇、语法还是修辞表达的方法,都或深或浅地打上了“西化”的印记。现代汉语在文化属性上的二元性,使得“汉语文学——民族性”或“现代文学——现代性”这种直线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常常遭遇尴尬;二是文学的层面——现代文学在创立的过程中,“西化”的色彩更加浓厚,特别是对现代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如写实主义文学观、个性主义文学观、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唯美主义文学观等等,都是从西方引入的。这些文学观念在汉语写作实践中落实时,必然与现代汉语发生复杂的联系。一方面,由于现代汉语保留着其作为一种东方语言的文化特征,这一文化特征不可避免地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中,与西方语言有着兼容性的文学观念产生一种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已经部分西化的现代汉语,又为现代文学中那些从西方引入的文学观念的落实,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且,由于现代汉语本身是在建构过程中的,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此从西方引入的文学观念,包括现代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又在现代汉语中不断创造着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发掘着汉语在叙事、描写、自我表现等方面的新的可能性,拓展着汉语的文化边界。不难看出,论文中的这样一些理论分析是极其具有独立识见的。

其实,泓峻这篇博士论文的学术价值绝不限于上述两个方面。该论文已获评2008年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其中的相关章节基本上也都已在《文史哲》、《四川大学学报》、《浙江学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这说明其学术价值已经获得学界的较高评价与认可。相信在正式出版之后,认真的读者还会有更多的收获。

泓峻是一位颇具理论天赋而又勤奋执著的年轻学者,此前已发表过不少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并出版过专著《文学修辞批评》,从文学修辞批评到这篇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可以发现泓峻的学术研究在逐渐形成自己的聚焦领域和治学特点,这是值得肯定的。不人云亦云、不随大流、不趋时尚而能够见出“自己”的学术,才有作头、有意思、有前途,我希望也相信泓峻在学术之路上能够走得更高更远!

2009年10月10日于济南千佛山下寓所

序 二

张宗正

泓峻博士把他再经修改即将付梓的博士论文《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送给我看，希望我能在这部书写一个序，我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意外。高兴，是因为见到了泓峻又一丰厚的学术硕果；意外，则是由于泓峻博士让我这样一个文艺学的门外人做文艺学大著的序言。接下来的当然是感到任务沉重和力不从心。

泓峻博士就是我二十多年前在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时教过的本科学学生张红军。在本科学学习时，虽然他对语言学科并不特别偏爱，而作为现代汉语和语言学理论教师的我，对他思维敏捷、好学不倦还是有相当深刻的印象的。

本科毕业工作一年后，他考入郑州大学读研，师从著名文艺心理学家鲁枢元教授，打下文艺学、美学理论的坚实基础，受到了良好的科研训练。取得硕士学位后不久，他就以泓峻的笔名发表多篇论文，并于199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人文的美学视点》。这期间的成果，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1999年泓峻由河南的一所高校调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其时我正担任中文系主任，但是，在我接到人事处转来他的调动材料并进行现场教学考察之前，他还不知道我在分校中文系负责，我也没有预先跟他做任何联系。他的调入，完全是靠自己教学和科研的实力。

泓峻调入分校后在教学上深得学生们一致的好评，文艺学方面的课程也成了学生们最喜爱的课程。由于我是讲授语言学课程的，学科的差别使我没有过多关注了解他的学术活动。近年来，他

却经常找到语言学科的老师交流,于是,我渐渐发现他对语言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的学术研究发生了新的转向——文艺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泓峻在和我的交谈中曾经表示脱离文学作品的语言所做的文学批评,没有根基,主观随意性太大。他开始尝试从文学作品的语言入手,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分析。于是,在这方面陆续有多篇学术含量颇高的精彩论文发表,并写出了一本叫《文学修辞批评》的专著。

2004年泓峻考取山东大学文艺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文艺理论专家谭好哲教授,又一次在学术道路的跋涉途中加油充电。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这本论著,就是他此前学术能量提升的检阅,也是他此后在学术前程上登高望远的奠基。

我因谭好哲教授考虑泓峻的博士论文同语言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希望有语言学科的研究者提出意见而成为其论文的评审者之一,因此曾在泓峻答辩之前认真阅读过其博士论文,并从语言学研究的角 度写出了我的评审意见。这次我又阅读了业经修改并增添内容的书稿,再一次为论文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构建、形成、发展、完善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充溢着辩证思维、闪烁着思想亮光的论述所吸引,为泓峻对这一问题从哲学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全面观照、深入剖析的研究态度、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所折服。

这部书稿在“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总论题之下,把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作为重点考察对象,试图描述这一关系展开的过程,发现其中的规律,总结这一过程留下的经验与教训。无论从现代文学诞生、发展、完善、成熟的过程来看,还是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文学语言的构建、发展、完善、成熟的过程来看,都是一个既有理论探索意义,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学术论题。

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形成发展轨迹的描述,一般都停留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承继古代近代白话文学形式的“白话文运动”和承继“通语”“官话”影响的“国语运动”两股潮流汇合而成澎湃之势，由是而建立起现代汉语的基础的粗略线条勾勒上。泓峻的书稿则从考察文学观念变革切入，研究探索文学观念变革发展对现代文学初期的创作与批评的变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并进而研究文学观念的变革与20世纪前期汉语语言变革之间的内在关联。书稿从语言与文学变革的共同社会语境、变革观念的共同价值取向方面，极有说服力地阐明了两者共同的内在变革动力，找到了两者共生互动的根脉或源头。书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全面细致地分析了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在实践层面的相互渗透，现实主义文学观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孕育和催生，以及现代文学观念在落实过程中引领和塑造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支撑并制约现代文学的相互依存共生共变的密切关系。泓峻博士还进一步研究了现代汉语的修辞追求对个性主义文学观的支持，指出文学语言的欧化、雅化、审美化对现代汉语建设的重要意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书稿提到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对汉语审美潜质的丢失、冲击，甚至破坏，以及三十年代文学大众化转向中存在的对正在进行审美建构的汉民族文学语言的误导等当前面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而应当深刻反思的问题，着实有理有据、启人思之深长！

以往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关系问题的研究，对文学作品关注较多，对文学观念相对忽视，关注的是作家作品的言语风格面貌，而对作为整个民族思维和民族文学创作工具的语言状况的研究则是一个明显的严重的缺失。本书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而且其视野是宏观博远的，论证是高屋建瓴的。

作为语言研究者，我特别赞赏泓峻作为非语言学专业的文艺学博士，能够对语言的相关知识、理论有那么广泛深入的把握和精准切当的运用。以前我也见过一些涉及语言学理论的文学评论的文章，但感觉多是语言学名词术语的铺排展示，而并未对语言学的

相关理论有准确的把握。泓峻则不一样,他的书中涉及的语言学科理论,是经典的,也是前沿的;他是把最基本的语言理论和知识用到文学建构的条分缕析之中,把文学观念的历史变革用在现代汉语的建构发展的一寸寸轨迹的探索中的。这真的是文艺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相结合的很好的范本。

我非常赞成泓峻博士在结论中提到的观点,在今后的文学研究中,“有必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家的语言状况进行深入的个人研究,在此基础上绘出一个以作家为中心的现代文学语言变化发展的谱系”,“有必要引入更多的语言学指标”。文艺学研究者同语言学研究者应该同心携手“将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家间的语言差异进行更细致的区分”,“将一些主要作家与主要文学时期的文学创作留在现代汉语中的痕迹进行更具体的辨认与更认真的清理”。

当然,这部书稿也有自己的不足。我以为泓峻博士把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共生共变的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把它们发生发展的轨迹描述得十分精细,而作为主观的评价还嫌不够鲜明,比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汉语美质的破坏,认识尚嫌不足。有些评价似乎也不那么合适,比如认为白话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在表达效果上优于文言,古汉语的写实性一定比现代汉语差,古代汉语“与西方语言相比,在对客观知识的表达上处于劣势”。不过任何一部书都不可能把所有问题、把问题的所有方面都讨论清楚的。总的来看,这部书是值得语言研究者,特别是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语言有兴趣的修辞学研究者认真读一读的。

以上说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主要是从这部书稿对语言研究的启发和推动而言的。至于本书在文艺学方面的价值,根本不是我可以随便讲的。

期待着泓峻博士有更多更好更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发表出版。

2009年6月于泰国曼谷朱拉隆功大学

导 论

一、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的提出

“语言学转向”是 20 世纪人文学科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这一转向过程中,语言对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决定作用,语言对包括哲学、宗教、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的深刻影响,是一个不断被提起的话题。正是这种理论氛围,催生了 20 世纪文学研究者的修辞意识。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与阐释的方法,在 20 世纪的文学研究中得到了普遍运用。文学研究者不仅强调语言限定了人对世界的认识,限定了人对世界作出反应的行为,而且强调在文学领域里,不同文本、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体裁之间的差异,都可以转化为语言问题,都可以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加以合理阐释。而且,由于文学总是以某种特定语言为媒介,因此语言的特性,深深地嵌进了使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学文本之中,为文本的叙事、描写、抒情设置了一个语言的边界。文学阐释活动,必须意识到这一边界的存在并对它加以说明。

然而,当把西方 20 世纪人文学科“语言学转向”中提出的问题移植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比语言与文学关系的一般状况要复杂得多,单纯的“语言决定论”观念并不能揭示其全部内涵。

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关系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表现在:

一、现代文学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是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语言变革而生成的一种语言。一方面,现代汉语作为汉语的一种新形态,

与古代汉语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使得它仍然与古代汉语保持着一定的同质性，从而与西方语言形成语言类型学上的明显差异。另一方面，现代汉语又是以古代汉语，特别是作为古代汉语核心的文言为自己的直接对立面而建构起来的，在现代汉语建立的过程中，“西化”一直是追求的目标之一。这使得与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无论是词汇、语法还是修辞表达的方法，都或深或浅地打上了“西化”的印记。现代汉语在文化属性上的二元性，使得“汉语文学——民族性”或“现代文学——现代性”这种直线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常常遭遇尴尬。

二、现代语言变革是以文学为突破口的。因此，现代文学在创立的时候，不是在利用一种既成的语言，而是在探索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现代文学最初的实践承担着创造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的双重任务。由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生成的过程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几乎无法确定是现代汉语创造了现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创造了现代汉语。而且，由于现代汉语作为汉语的一种新的形态，到现在其历史还不足百年，对于一种语言形态而言，这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年龄。因此，现代汉语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境界，在整个 20 世纪当中，特别是 20 世纪前期，现代汉语仍然处在自己的建设期。在这一建设期内，一方面现代汉语的当下形态对现代文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现代文学的实践也始终影响到现代汉语品格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它们是共生的；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它们是互动的。

三、与现代汉语相比，现代文学在创立的过程中，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更深，“西化”的色彩更加浓厚。特别是对现代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如写实主义文学观、个性主义文学观、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唯美主义文学观等等，都是从西

方引入的。这些文学观念在汉语写作实践中落实时,与现代汉语发生了极其复杂的联系。一方面,由于现代汉语保留着其作为一种东方语言的文化特征,这一文化特征不可避免地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中,与西方语言有着兼容性的文学观念产生一种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已经部分西化的现代汉语,又为现代文学中那些从西方引入的文学观念的落实,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且,由于现代汉语本身是在建构过程中的,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此从西方引入的文学观念,包括现代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又在现代汉语中不断创造着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发掘着汉语在叙事、描写、自我表现等方面的新的可能性,拓展着汉语的文化边界。这种基于现代汉语自身的二元性而产生的现代汉语和主要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学观念既兼容又排斥的关系,以及由于汉语自身还在建构过程当中,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主要从西方引入的文学观念在落实过程中对现代汉语品格的重塑,构成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共生与互动关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四、从观念的层面讲,现代汉语的修辞追求与现代文学的价值观念之间也有一种共生与互动的关系。无论是现代的语言变革,还是现代的文学变革,都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初期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一个组成部分。借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现代语言变革者与文学变革者追求的目标。现代汉语在建立之初,把反对形式主义作为一个口号,是否通俗化、口语化,是否恰切地表达了语言主体的思想情感,能否准确客观地呈现语言所描写的对象,成为判断语言表达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些修辞原则。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也以反对古典文学中的形式主义为号召,把准确地传达新生知识分子对世界的新的体验与感受、客观地再现社会人生真相、用大众能够接受的形式启蒙大众设定为文学的最重要的目标。因此,写实主义文学观与现代汉语的写实性追求之间、个性主义文学观与现代汉语直抒胸臆的修

辞理想之间、启蒙的文学观与现代汉语的口语化主张之间,是相互呼应、相互支持的。然而,就现代文学观念而言,在表现自我、再现社会人生、启蒙大众之外,还有一个关注自身审美价值的维度。根据现代思想家们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最初设计,审美的启蒙也是现代性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经历了最初的白话与文言之争之后,一些文学家发现,新生的白话文学,尤其是白话诗歌,“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所以为诗”^①,在形式上相当粗陋,于是产生了从语言形式上完善新文学的要求。现代文学中这种形式审美主义观念的出场,不仅直接参与了作为现代汉语核心的现代文学语言的审美建构,而且也促进了现代汉语审美意识的觉醒。

因此,在讨论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一方面,我们要有充分的修辞意识,认识到现代汉语作为一种媒介,给现代文学提供的语言的边界,对现代文学性质的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的共生与互动关系,关注现代文学观念、现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对现代汉语的塑造。同时,在讨论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文化身份时,充分注意到其中西兼容的二元性及由于这种二元性而在其内部存在的矛盾与冲突。

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关系的这种复杂性,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极具诱惑力,而且极具挑战性。

二、相关研究的状况

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国 20 世纪的文学研究中,相当长时期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早在五四时期,作为现代文学革命首倡者之一的胡适就提出了“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这样的命题,揭示了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密不可分的关联。现代文学早期的研究者中,有些人也曾意识到汉语自身的特征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比如,朱光潜认真比较了欧洲语言与汉语

^① 梁实秋:《读〈诗的进化的还原论〉》,载《晨报副刊》1922 年 5 月 27 日。

的差别,指出汉语与欧洲语言发音特点的不同,使其形成音乐性节奏的要素存在着差异。欧洲语言的音律节奏多依赖音长、音高与音的轻重三个因素,而汉语四声与许多双声叠词对于节奏的影响很小,主要功能是造成声音的和谐。因此,汉诗在语言形式上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诗歌。^① 朱自清则指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相比实际上已经有了欧化倾向,并认为汉语的欧化是一个从书面语开始,渐次到口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化的现代文学语言起了先导的作用。^② 然而,包括胡适、朱自清、朱光潜在内的早期接触到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关系这一命题的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工具论语言观的影响。工具论的语言观制约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思考的深度。所以,作为现代文学载体的现代汉语的特性问题、现代汉语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问题、现代文学怎样承担起塑造现代汉语的使命问题,在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真正的重视,虽然个别学者也做了一些零星的相关研究,发表了一些零星的成果,但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

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被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到国内文学研究者的议事日程上来,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对其起到很大推动作用的,是 90 年代初期对现代中国历史中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思及由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激起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首先,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有学者针对 80 年代西方话语泛滥的情况,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认为中国文论自己的范畴与汉语文学之间有文化上的亲合性,并试图探索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转化的可能性。接下来,在诗歌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应该

① 朱光潜:《诗论·第八章》,载《朱光潜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

② 朱自清:《中国语的特征在哪里——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朱自清全集》第三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